

辯證法矛盾律論中共軍事 戰略決策思維

副教授 李明正

提 要

隨著中共軍隊日益的外向性，中共軍事戰略屬性是具有威脅的攻擊性質，抑或如北京所堅稱的防禦性質，就成為中共軍事研究辯論的焦點。本文試圖從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矛盾律為思考基礎，分析中共軍隊在化解戰略三要素(力、空、時)矛盾過程中所制訂的軍事策略歷程，並主張中共軍事戰略對區域與全球構成以安全、防禦為名的威脅。

關鍵詞：中共、軍事、戰略、辯證法

前 言

2018年1月15日，日本政府公開指出，中共海軍可搭載長程巡弋飛彈的「商」級攻擊型核動力潛艦，此前曾出現在釣魚台列嶼鄰近水域。東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也對中方加劇緊張的行為，再次表達嚴重關切。¹毋庸置疑，這顯然並非單一個案，更非單純意外。隨著中共軍事力量快速提升與軍事活動範圍的明顯擴增，北京正與包括台灣在內的周邊國家爆發領土(海)主權與軍事活動路徑的爭端，對於中共軍事戰略是否威脅區域與全球和平的關切與辯論，也更甚於過去。²對

此，有學者主張，中共軍事戰略已經從「積極防禦」轉向「積極進攻」，在演變過程中，共軍大量參酌美軍「聯合作戰」的組織架構，使共軍在空中、太空、網路和電磁戰場能取得明顯優勢，保持最大發揮戰力，突破美軍近年逐步以太空裝備所建立的第五代系統的高端、高科技能力。³另有學者將「積極進攻」作為對中共海軍作戰的指導思想。⁴這意味著未來中共軍事威脅將隨著軍事能力增長而有更強烈意願威脅其他國家的安全與利益。

一般而言，中共軍事戰略的研究者，傾向拿現有西方相關理論套用、解釋或預測北

1 蔡佩芳，「日本證實陸攻擊型潛艦上周接近釣島」，聯合報，2018年01月16日。

2 Peter Navarro, Gordon G. Chang,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15).

3 張延廷，「共軍新布局 壓縮國軍空間、區域爭霸」，聯合報，2017年10月30日。

4 許衍華，精兵合成高效：中共高技術局部戰爭能力的虛實(台北市：秀威資訊出版社，2005年4月)頁222。

京的戰略發展與變遷動向。⁵但此一作法往往容易導致誤解並產生錯誤的迷思；⁶美國的中共軍事研究專家易思恩(Ian Easton)便警告，我們不應以「鏡象」(Mirror Image)模式看待中共軍事現代化，而必須以其發展脈絡中尋求客觀且貼近事實的真實樣貌。這方面，無論馬克思主義或中國傳統文化都講究矛盾律，台大歷史系教授呂世浩即論及，中國文化認為，萬事萬物皆有兩端，陰陽、虛實、正反、表裡等等都需涵蓋，才是完整的整體。⁷

數十年來，除中國大陸之外，我國與西方國家不斷有學者主張從辯證法，特別是矛盾律對中共軍事進行研究，⁸並且獲得頗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就國內而言，除了早期學者蔡沈之以辯證法研究中共軍事發展外，⁹我國前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博士則曾於1988

年主張，北京乃採用辯證法的「二元整合」(integrated dualism)，也就是「矛盾律」進行戰略思考。¹⁰在2017年與亢樂義合著的《撥雲見日：破解美中台三方困局》中，林中斌再度確認矛盾律是理解北京戰略的重要途徑；¹¹中山大學俞劍鴻教授從矛盾律的角度，分析並預測共軍對台動武的條件與時機；張明睿從矛盾律探究中共解放軍的戰略決策；¹²兩岸和平研究中心張蜀誠與吳建德博士，以矛盾律為途徑，分析中共對台策略；¹³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競，探討中共矛盾律運用於對台戰略的影響；¹⁴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余元傑教授，從辯證法的矛盾律策略，探討中共地緣戰略、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與南海軍事化建設的策略；¹⁵張蜀誠博士另從矛盾律途徑，分析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中的辯證性戰略。¹⁶上述學者，均對中共軍事戰略研究提出另外的

- 5 參見翁明賢，「解構中國國家安全戰略」，收錄在李大中主編，龍鷹爭輝：大棋盤中的台灣(新北市：淡江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10月)頁4-6。
- 6 有關西方理論對中國政治與經濟的偏見及誤解，可參見Arthur R. Kroeber, *China's Econom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7 呂世浩，霸王之夢：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4(台北市：平安文化出版社，2017年2月)頁5。
- 8 David M. Lampton, *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p.220-2。
- 9 蔡沈之，「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剖析」，中共研究，第10卷，第8期，1976年8月，頁108-114。
- 10 Chong-Pin Lin, *China's Nuclear Weapons Strategy: Tradition with Evolution*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88) pp.25-28。
- 11 林中斌、亢樂義，撥雲見日：破解美中台三方困局(台北市：時報出版社，2017年8月)頁153。
- 12 張明睿，解放軍戰略決策的辯證(台北：黎明出版社，2003年5月)。
- 13 張蜀誠、吳建德，四個寄希望：解構中共對台戰略(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14年8月)。
- 14 張競，「兩岸和平發展政策面與技術面之辯證」，收錄在，大陸全國台研會、社科院台灣研究所主編，第23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論文集，2014年7月，頁56-62。
- 15 余元傑，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與兩岸關係(新北市：大揚出版社，2017年3月)頁3-38。
- 16 張蜀誠，「中國大陸辯證性地緣戰略：以北京應對北韓2017年4月核武危機為例」，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59期，2017年8月，頁42-61。

途徑，擴大了相關研究的視野。

不過，由於篇幅的限制，這些學者僅能針對某一時期或某一事件進行分析，未能進一步驗證中共是否自始至終都是以矛盾律思考戰略問題，並進一步訂定化解矛盾的戰略作為，這成為相關研究無法迴避的邏輯性漏洞。畢竟，一時、一事的正確，並不能證明整體的正確，但整體的正確卻能證明部分的正確。誠如新新聞總主筆顧爾德所主張，要瞭解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大陸，就必須熟悉中共黨史脈絡。¹⁷為此，作者嘗試從辯證法矛盾統一律的途徑，從戰略三要素的「時間」、「空間」與「力量」分析中共軍事戰略整個發展脈絡，¹⁸期能驗證以矛盾律作為中共軍事研究的有效性。

人民戰爭之積極防禦：誘敵深入

1927年8月1日是中共人民解放軍建軍日，當時工業化的戰爭型態，對於剛成立的共軍相當不利，為求生存而必須對抗具機械化工業優勢之敵，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首要戰略目標。

一、時間：半工業戰爭型態與工業戰爭型態的矛盾

《新戰爭論》(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作者艾文·托佛勒夫婦論及人類戰爭型態時，採用與人類文明發展軌跡作為戰爭型態的分野。作者們主張，戰爭型態可區分為農業戰爭型態、工業戰爭型態與資訊戰爭型態。¹⁹1840年起，中國所遭遇的百年恥辱近代史，究其根本，即在於當時清朝武力屬於農業時代的樣態，但在鴉片戰爭中所面臨的英國則屬於工業革命時代的強權，²⁰因此，誠如每一本《中國近現代史》所敘述，戰爭失敗與接下來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讓中國大陸陷入次殖民地困境，幾乎毫無懸念。²¹對此，唯物辯證法的祖師爺馬克思(Karl Marx)以馬基維利主義(Mandevillian)角度指出，英國是在推進中國的文明，消滅中國的古老文化，打開中國的門戶。²²

回過頭來看，艾佛勒夫婦的論點其實存在著過度簡化的問題，其實在農業、工業與資訊時代之間，存在許多過渡階段，例如波灣戰爭儘管被視為全球第一場資訊戰爭，但實際上在當時美國仍處於機械化工業時期，²³網路才剛剛出現、武器資訊化仍遠遠不足，因此只能算是半個資訊化作戰。要等到國家

17 顧爾德，「推薦序：以史為鑑，看懂習近平」，洪耀南，中共百年看習近平十年(台北市：新銳文創，2017年10月)頁19。

18 李黎明，轉軌：變遷中的戰略思維(台北：時英出版社，2001年8月)。

19 Alvin Toffler, Heidi Toffler,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Little Brown & Co, 1993).

20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48-71.

21 小島晉治與丸山松幸著、葉寄民譯，中國近現代史1793-1985(台北市：帕米爾書店，1996年)頁11-218。

22 「馬克思支持英國鴉片戰爭侵略中國」，大紀元，2010年11月07日。

23 張利華，誰主宰未來戰場？高科技戰爭中的軍兵種(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8月)頁49-67。

整體產業以資訊業為主體的資訊時代的資訊作戰，才能算是完整的資訊作戰。²⁴中共亦然，儘管中共處在工業化作戰時期，但無論是江西瑞金蘇維埃政府、陝西延安政府或是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中國大陸的經濟都是以農業為主，因此只能進行半工業的戰爭型態。²⁵

打從1927年建立武裝力量起，僅有半工業能力的中共紅軍所面臨的國民政府軍隊，是正在走向機械工業化的武力威脅，無論在軍隊數量或是軍隊質量上，中共解放軍的前身紅軍皆遠遠落後；抗日戰爭時期所面臨的日本，更是在當時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擁有舉世最精良的現代化軍隊；接下來，1949年取得大陸政權後，面對的是美國與蘇聯的軍事威脅，而這兩個國家是當時全球唯二超級強權，不僅軍事力量強大，而且還擁有信度與效度均高的核武嚇阻能力。由此可知，縱貫整個毛澤東時期屬以農業為經濟主體，中共軍隊始終處於半工業戰爭型態對抗機械化工業戰爭型態的矛盾之中，且情況對共軍極其不利。

「人民戰爭」戰略的制訂，主要著眼點便在於如何在半工業模式對抗工業化模式的

險境中，確保中共政權及其軍隊的生存。²⁶對此，共軍能迴避就迴避，例如對日抗戰時期的「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自己」的以求生存為主要目的的抗日策略；²⁷若無法迴避，人海戰術，就成為中共以農業人口數量優勢對抗敵人的武器裝備優勢的策略，²⁸韓戰便是一個深具實證性的戰例。在這方面，如何確保人民對中共政權及其軍隊的支持，並進一步直接或間接參與中共戰爭活動，迅速極大化人數的力量，就成為共軍軍事作戰之外的最重要政治任務。²⁹

二、空間：正面戰場與非正面戰場的矛盾

在對抗機械化工業化戰爭型態上處於生存窘境中共軍隊，在作戰空間上若與敵方進行正面戰場廝殺，其結果將與清朝1840年以後的下場沒有不同，絕對是以卵擊石式的軍事災難。關於這一點，可以從中共1927年至1935年期間軍事路線鬥爭得到證明。此期間，人民戰爭戰略尚未產生，毛澤東也不是中共最高層決策者，當時中共總書記王明遵從馬克思工人暴動革命的教條，以及蘇聯軍事顧問李德的意見，對國民政府軍隊採取城市正面鬥爭路線，其結果就是遭到國軍五次

24 David S. Alberts, John J. Garstka, Richard E. Hayes, and David A. Signori,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Age Warfare* (Washington DC.: Command and Control Research Program, DoD, USA, 2001) pp. 7-14.

25 Jonathan R. Adelman, Chih-Yu Shih,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ational Chenchi University, 1993) pp.32-87.

26 蔡沈之，「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剖析」，中共研究，頁108-114。

27 毛澤東對於中共所發動對日百團大戰表達非常憤怒的態度，警告中共軍隊不應在正面戰場上與日軍對抗。參見莊魯迅著、劉宗德譯，*台灣不教的中國近代史*（台北市：大是文化出版社，2011年9月）頁62-88。

28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輯（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頁102；張念鎮，「中共究竟怎樣進行『人民戰爭』（下）」，中共研究，第5卷，第7期，1971年7月，頁59。

29 John Gittings, *The Role Chinese Army*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1) pp.6-12.

圍剿，不僅在城市節節失利還危及中共政權的安全，不得已只好進行名為「長征」，其實是一場大潰逃的流竄行動。³⁰

1935年1月中共在遵義召開會議後，確定並批評王明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與教條主義，³¹並確立毛澤東的軍事路線，不在正面戰場上與力量優勢之敵作戰，也不以奪取城市為主要戰略目標，而是在非正面戰場，特別是日軍與國民政府所力有未逮的邊區、農村與深山，藉著地理優勢削弱、打擊甚至殲滅優勢之敵。³²1949年以後，隨著掌握中國大陸沿海海域，共軍也將游擊戰策略運用在「海上人民戰爭」，以適應新的戰場空間需求。³³此一「誘敵深入」戰略思維，一直延續到1960年代的「三線政策」，也就是在面對美軍或蘇聯軍隊的優勢進攻威脅下，將軍工生產能量設置在戰略後方，以免在戰爭一開始就被消滅殆盡，並計畫以誘敵深入的方式，逐步消滅優勢敵人。³⁴對此，毛澤東主張中國大陸必須「深挖洞、廣積糧」，以利從非正面戰場上與敵決戰。

三、力量：正規作戰與游擊戰的矛盾

面對工業化戰爭能力優勢的敵軍，中共採取游擊戰以充分發揚山區作戰的優勢，殲滅來犯之敵。在這裡，人民戰爭又可區分兩個子矛盾：土匪游擊戰與思想型態游擊戰的矛盾，以及消極防禦與積極防禦的矛盾。

喜讀歷史的毛澤東，認知到中國歷代武裝對抗中，游擊戰往往能夠在一時之間克服正規作戰的威脅，但過去的山寨土匪打游擊往往只是為了眼前利益而打家劫舍，最終不是投降、收編為官軍，就是因為人民的痛恨並與官軍合作而遭到殲滅。對此，共軍以共產主義為中心思想，重視軍中政治思想工作，藉此達到「官兵一致」、「軍民一致」以瓦解敵軍的作戰目標，³⁵並以殺土豪、地主將土地財產分給農民換取支持，以避免重蹈歷史失敗宿命。³⁶

另一方面，誠如《水滸傳》給予毛澤東的啟發，³⁷在防禦上區分消極與積極兩種矛盾性質。所謂消極防禦是指，在戰略與戰術上均採取防禦的作戰策略；而積極防禦不同之處，在於戰略與戰術上的矛盾或辯證性運用，亦即戰略上採取防禦策略，但在戰術上

30 Jung Chang,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Anchor, 2006) p.72-98.

31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年6月)頁13-20。

32 徐焰，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11月)頁21-22。

33 Alexander C. Huang, "The PLA Navy at War, 1949-1999: From Coast Defense to Distant Operations", in Ryan Mark, ed.,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9) pp.70-2.

34 Alexander V. Pantsov,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013) pp.626-663.

35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輯(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頁501。

36 GiriDeshingkar, "Mao Zedong's Military Thought: A Perspective", China Report, vol. 31, no. 1, Feb.- March, 1995, p.102.

37 Georges Tan Bok, "Strategic Doctrine", in Gerald Segal and William T. Tow (eds.), Chinese Defense Policy (London: The McMillan Press, 1985)p.4.

則採取進攻，藉著地理崎嶇與縱深，逐步透過主動攻擊以削弱敵人力量，達到戰略防禦的目的並在最終消滅來犯之敵。為此，毛澤東提出游擊戰的十六字方針，「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其後的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期間的三個階段「戰略撤退、戰略僵持與戰略反攻」，則是游擊戰戰法的戰略運用。此外，一如前述所論及，中共海軍正式成立之後所採用的「近岸防禦」戰略，雖說是吸收蘇聯海軍戰爭思想，但也是人民戰爭中軍事辯證法思維的海上作戰延伸性運用。³⁸

再者，基於馬克思辯證法，在敵我矛盾力量上，除了軍事作戰外，對敵人進行統戰以爭取敵方陣營敵對勢力，擴大自己「朋友圈」力量，同時孤立、縮減敵人力量，就成為中共求生存並贏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對此，誠如中共中央統戰部所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書中所強調，如何「聯合明天敵人打擊今天敵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就成為極為重要的戰爭手段。³⁹

必須注意的是，敵我雙方力量對比是動態而非靜態，處於工業戰爭能力弱勢的共軍，儘管強調以弱勝強的矛盾對立統一策

略，確保中共政權的安全，但這並非表示中共以此為滿足。事實上，北京在以人民戰爭對抗工業程度優勢之敵時，也積極發展自身工業產業與科技能量。⁴⁰在進行軍事現代化過程中，中共遭遇到自身工業程度原始的現狀與發展高度工業能力之間的矛盾困局，對此北京同樣採取辯證法對於矛盾對立進行「量變質變」為因應策略。首先，在經費有限情況下，核武與傳統武器發展孰先的矛盾上，北京採取以「兩彈一星」為重心，積極研發核子武器，以對敵人核子攻擊的威脅進行嚇阻，同時持續以人民戰爭作為傳統武器質量不足的解決方案，俟核武研發成功後，再投入傳統武器的研製工程。⁴¹

其次，在武器裝備作戰能量的建構上，對外採購與自行研製兩派主張所造成的矛盾，北京採取在工業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先行採購以應付安全需求，再隨著工業技術的增長逐漸加大自製的份量，直到最終完全自製為止。⁴²直到今天，北京仍然在武器裝備發展上採取此一策略，而且買得到就「山寨」，再推出改良版；買不到就用竊取的方式，弭合與敵人之間裝備競爭上的落差。⁴³

歸納而言，從中共成立到毛澤東主政結

38 張蜀誠，中共海軍戰略發展對亞太地區的影響(1949-1997)(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1998年8月)頁66-68。

39 中共中央統戰部主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年10月)。

40 Harlan W. Jan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Boulder: West View Press, 1982) p78-102.

41 有關中共發展「兩彈一星」所引發的軍備發展路線矛盾之爭歷程，參見中共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244-252。

42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2月)頁31。

43 有關中共間諜行為，除美國國會的考克斯報告外，也可參見David Wise, *Tiger Trap: America's Secret Spy War with China*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1).

束，為了確保共產黨與共軍的存活，在面對工業化優勢之敵，必須充分運用農業國家的優勢，在戰爭型態上以人海戰術優勢來應對敵人武器裝備優勢；在作戰空間上避免在城市與正面戰場上作戰，而選擇基礎設施原始落後，不利於現代交通工具的邊遠農村與山區，進行誘敵深入的積極防禦作戰。其中，人的因素決定戰爭最終成敗，因此積極宣揚共產主義並以「三項紀律八項注意」的愛民作風，將自地主身上奪取的土地財產分配給貧農，換取人民對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支持，以及共軍所需的人力補充，就成為人民戰爭的戰略主軸。就維護安全而言，人民戰爭戰略可以說相當成功，但就國家利益而言，則損失不少，更重要的是，隨著戰爭型態的改變與戰場層級的變化，人民戰爭顯得力有未逮，不進行重大改變將傷害國家利益，也有損國家安全。

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之積極防禦

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戰略，儘管解決中共政權的生存問題，但防禦大陸本土有餘，但卻無法有效應對科技居於優勢的美國與蘇聯，對中國大陸進行「外科手術」式的軍事

打擊；⁴⁴更有甚者，要奪回被佔領的領土、領海及其島嶼主權，則明顯不足；⁴⁵要發動一場境外作戰，則窘態畢露。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在快速工業化發展的同時，由於安全重心轉移至沿海，如何解決原有人民戰爭戰略無法適應新的安全情境，以及境內作戰與境外作戰的矛盾，⁴⁶就成為此時期「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戰略的主要內涵。

一、時間：臨戰狀態軍事建設與和平時期軍事建設矛盾

毛澤東認為戰爭本質可分為帝國主義侵略的不正義戰爭，以及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之戰，只有社會主義戰爭才能永久消弭戰爭。⁴⁷此外，毛堅信帝國主義一定會侵略社會主義而引爆戰爭，因此必須隨時做好應戰的準備。⁴⁸毛澤東時期便曾針對軍隊的「紅」與「專」的矛盾軍事路線，發生過相當嚴重的鬥爭，最終毛派的「政治掛帥」成為軍隊建設的主流思想，特別是在飽受外部侵略威脅的「臨戰狀態」，以及中國大陸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讓中共軍隊在「紅」與「專」的矛盾中，過度傾向軍隊的政治角色，將專業化軍隊建設視為資本主義軍事路線。⁴⁹此一狀況，曾經引起時任總參謀長的鄧小平批評，解放軍犯有「腫、散、

44 David Armstrong, "The Soviet Union", Gerald Segal & William Tow (eds.), Chinese Defense Policy, pp.191-2.

45 張召忠，海洋世紀的衝擊(北京：忠信出版社，1990年)頁80。

46 Jonathan Pollack, "Defense Moderniz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RAND Note Prepare for The U.S. Air Force, Oct. 1979, p.3.

47 毛澤東，毛澤東選輯(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頁449-457。

48 陳培雄，毛澤東戰爭藝術(台北：新高地出版社，1996年6月)頁114。

49 Frederick King Poole, Mao Zedong (New York: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Data, 1982) pp.61-96.

驕、參、惰」的弊病。但終其毛澤東時期，中共人民解放軍仍然沒有解決過度政治化所導致的問題。

鄧小平鬥倒華國鋒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之後，正式改變過去鎖國政策，對外改革開放，以有效推動「四個現代化」的同時，建構具備工業現代化軍隊的需求也比過去更加急迫。⁵⁰對此現代化戰爭與人民戰爭之間的矛盾，共軍將領們開始打破過去政治禁忌，敢於表達對人民戰爭戰略無法應付現代條件下戰爭挑戰的憂慮，並相繼提出自己的見解。例如，1977年粟裕便以非常謹慎的方式提出「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術語，作為化解矛盾的解方，並強調運動戰、進攻戰、速決戰與陣地戰的重要性。⁵¹

隔年3月，鄧小平在中共軍事科學院20週年講話時，要求該院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並研究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⁵²6月又在中共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一面強調要堅持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又強調「時間不同了、條件不同了、對象不同了，解決方法也不同」。⁵³在在顯示出，鄧小平試圖在既有

的毛澤東軍事思想，與現代戰爭需求之間的矛盾衝突中，尋求化解衝突的辯證性解決之道。更有甚者，鄧小平主張世界大戰一時之間不會爆發，⁵⁴因此將中共軍隊由過去的「臨戰狀態」改為「和平時期的軍隊建設」，要求解放軍必須走向「現代化、專業化、政治化」，⁵⁵作為化解「紅」與「專」的矛盾，並且建構能應付工業現代化戰爭的挑戰。

從上述「三化」可見，在「紅」與「專」的矛盾中，鄧小平的矛盾對立解決方案比較偏重於過去所認為「資本主義軍事路線」，但卻又避免「純軍事路線」的譴責。可以說，此一階段不僅是一個妥協的階段，也是一個過渡的階段。

二、空間：境內作戰與境外作戰的矛盾

中共取得大陸政權之後，作戰地域從過去的邊遠山區、農村，逐漸擴散到整個大陸及周邊島嶼，此期間不僅武力佔領西藏、西南省分的攻佔，完成整個大陸本土置於中共統治之下，還相繼攻佔除金馬、馬祖之外的大陸東南沿海島嶼及海南島。然而，一方面作戰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必須將有限的資源

50 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Hampshire: The McMillan Press Ltd., 1993) pp.36-44.

51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p.77.

52 Yao Yunzu, "The Evolution of Military Doctrine of the Chinese PLA from 1985 to 1995",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pp.74-5.

53 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

53 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頁109-114。

54 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頁74-5。

55 同前註，頁75。

用在「誘敵深入」以確保共產主義政權的生存安全上，因此對金門、馬祖、台灣，以及其所主張的釣魚台、南海9段線內的領海及其附屬島嶼，仍無法透過軍事力量解決。⁵⁶1974年的西沙海戰之所以成功，是利用冷戰結構中的漏洞，也就是在越南政府衰弱、美國為討好中共而妥協的時機所為，但因為解放軍正規作戰能力不足，也贏得相當僥倖。⁵⁷

1978年以後，由於中國大陸將國家政策轉向改革、開放，並在沿海設置「經濟特區」後，整個國家經濟高速擴張的結果，就是過去人民戰爭的「誘敵深入」之積極防禦，因為沿海第一線城市成為中國大陸安全的新重心而不再適用；⁵⁸換句話說，在改革開放時期，北京必須以防範並防衛敵人入侵本土為戰場經營目標，所謂「誘敵深入」的空間，也因此必須從過去的本土，向前延伸至海上，以免高度經濟發展城市遭到戰火波及而嚴重危害中國大陸安全的「一個基本點」的經濟發展。⁵⁹

整體而言，在中共發展出最小嚇阻的核子戰略能力，並具備全球數量最大的地面部

隊之後，除與蘇聯、印度、緬甸與不丹等少數國界與領土爭議外，基本上中國大陸本土安全無虞，但海外爭議主權未能回收，不僅為民族主義情緒所不許，擁有豐富石油與其他金屬礦物的釣魚台與南海，則有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利益；⁶⁰更有甚者，台灣與南海地屬國際重要戰略海洋通道，掌握在強敵手上將嚴重縮短中國大陸戰略預警時間，以及作戰縱深。⁶¹

可以看到，在中共1985年將原先「人民戰爭」戰略轉變為「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戰略的同時，中共海軍也將過去的「近岸防禦」戰略轉變為「近海防禦」，從事「大型化、飛彈化、電子化」建設，並積極擴張海上軍事活動範圍，以期能確保第一島鏈內的安全，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也為未來近海作戰與領土(海)規復奠定軍事基礎。⁶²顯見，在境內作戰與境外作戰上，中共軍方隨著本土安全的信心逐漸強化的同時，也將過去作戰戰場由沿海到內陸的「三線」、東北、西北、華北的「三北」，轉向以黃海、東海與南海為重心的「三海」戰略

56 Danelle Morton, "Chinese Undergoes a Revolution of its Own?", Washington Times, Jan. 15, 1985, p.6A.

57 海軍史編委，海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161-6。

58 June Drever,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Orbis, Winter 1984, pp.1101-26.

59 Greg Austin, China's Ocean Frontier: International Law, Military Forc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Canberra: Allen & Unwin Australia Pty Ltd, 1998) pp.46-60.

60 林賢參，「台海兩岸與日本在東海爭端之戰略意涵」、戴孝君，「南海局勢與兩岸關係」，均收錄在吳建德、張蜀誠主編，太陽花學運後的兩岸關係與南台灣(高雄市：樹德科技大學兩岸和平研究中心，2016年3月)頁65-98。

61 Shelley Rigger, Why Taiwan Matters: Small Island, Global Powerhouse(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pp.13-36.

62 Mark Burles, Abram Shulsky, Pattern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RAND, 2000) p.256.

方向。⁶³

三、力量：游擊戰武力與機械化武力的矛盾

1979年中共發動一場懲罰性的對越南戰爭，結果由於軍隊現代化能力不足，導致在國際上「不知誰懲罰誰」的譏諷。⁶⁴對於「懲越戰爭」究竟是中共軍隊走向現代化道路的原因還是結果，至今存在很大爭議。但共軍走向現代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對越作戰不力的刺激，則毫無疑問。⁶⁵同樣不可忽略的是，鄧小平將收復台灣作為1980年代國家三大戰略目標之一，但在共軍缺乏境外作戰的能力情況下，即使美國沒有出面干預也不容樂觀。⁶⁶這形成了共軍游擊戰武力與工業時代機械化武力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懲越戰爭」之後共軍在游擊戰武力與機械化武力的選擇上達成共識，但由於北京推動改革開放，需要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美軍在區域的持續軍事存在，以及四百萬共軍的裝備過於老舊，而中共必須將資源集中用於經濟改革與現代化等因素，讓中共軍隊轉型格外曲折。

在鄧小平要求解放軍軍隊建設必須服從經濟發展大局的情況下，⁶⁷軍事現代化被列為「四個現代化」的末位，其結果是中共軍事費用在1980年代不增反減，1985年將過去游擊戰思維的11個軍區，縮減為7大軍區，同時還進行百萬大裁軍；⁶⁸更有甚者，由於軍費不足，中共中央默許軍隊經商以自籌軍費，這不僅導致軍隊與民爭利亂象，在經商過程中的貪污腐敗與不務正業，也嚴重戕害軍隊應有的紀律與戰力，⁶⁹形成軍隊未來走向現代化武力的隱患。

儘管如此，此時期的中共軍隊，在縮編之後逐漸強化軍隊的正規化與專業化建設，與改革開放同步與外國進行軍事交流，並透過與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的軍事教育與軍事科技的合作，解決武器裝備老舊與過時的問題。⁷⁰與此同時，中共海軍的員額在百萬大裁軍的縮減之後，再度逐漸回升，顯示出北京決策者對於海軍在未來戰爭角色的正視與重視。這一點，可以從海軍過去隸屬於陸軍的地位，轉變為獨立作戰單位可以看出。⁷¹與

63 張蜀誠，「中共海軍戰略與艦艇發展分析」，收錄在中興大學「中國大陸與亞洲區域海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年6月，頁47-62。

64 Hammond Rolph, "China's Changing World View", in Segal & Tow (eds.), Chinese Defense Policy, 173.

65 Laurie Burkitt,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W. Wortze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SSI, 2003) pp.83-102.

66 張蜀誠、吳建德，四個寄希望，頁63。

67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159。

68 P. B. Godwin,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Boulder: West View Press, 1989).

69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66-287.

70 Chong-Ping Lin,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erception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Security and Studies, vol. 3, no.4, Summer 1994, pp.722.

敵人進行一場拒敵於本土之外的正規戰爭，於是成為中共海軍無法迴避的挑戰與任務。⁷²

從後見之明的角度看來，雖然鄧小平縮減軍費與軍隊員額讓1980年代的中共解放軍感到不滿，也阻礙軍隊由游擊武力轉向機械化武力的步調。但誠如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霸權興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所揭櫫，過去由於經濟與技術發達而崛起的強權，在透支軍事費用，擠壓國家正常發展後，最終不免崩潰的命運。⁷³即使是曾為全球超強之一的蘇聯，也在軍費過度擴張的情況下，最終落得瓦解與衰弱的下場。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卻以經濟發展為優先，同步建構現代化經濟體系與科技之後，再以國家發展的「盈餘」用於軍隊現代化所需，「先富國再強兵」不啻是相當謹慎且正確的作法，儘管留下了棘手的後遺症。

打贏信息化戰爭

1991年的沙漠風暴作戰，不僅標誌著戰爭型態由過去的機械化戰爭型態，正式轉變

為資訊化戰爭型態，讓全球積極進行新軍事事務革命，⁷⁴也在相當程度上衝擊正在緩慢進行機械化現代化的共軍，結束人民戰爭與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矛盾，同心克服機械化與信息化戰爭的矛盾，朝打贏信息化作戰方向邁進。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凱利·布朗(Kerry Brown)指出，將習近平比擬為21世紀的毛澤東是不適當的，因為大陸所處的內外環境均已大不相同，習近平是無法做到當初毛的事情出來的；⁷⁵就戰略的矛盾對立整合策略而言，目前解放軍由於積極進行正規作戰部隊的現代化工程，因此比過去更加強調正規作戰。但這並不表示解放軍放棄毛澤東持久作戰的戰略指導方針。相反，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指出，毛澤東思想對當今中共維權仍有價值。⁷⁶特別是在綜合國力的較量上，北京仍然以辯證法的矛盾律作為進行國際鬥爭的戰略指導方針。

例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013年12月在主持「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動全黨學習

71 David G. Muller Jr., *China as a Maritime Power* (Boulder: West View Press, 1983) p.233.

72 Bernard D. Cole,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in Susan Puska, E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Next* (Carlisle: SSI, 2000) p.87.

73 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張春柏，陸乃聖譯，*霸權興亡史：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3版)(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14年3月)。

74 MacGregor Knox, Williamson Murray, *The Dynamics of Military Revolution 1300-20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12-335.

75 Kerry Brown, "Why Xi Jinping Can't Be a 21st Century Mao Zedong", *The Diplomat*, February 16,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2/why-xi-jinping-cant-be-a-21st-century-mao-zedong/?utm_content=buffer66203&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campaign=buffer

76 陳筑君，「習不讓「毛思想」變路障」，*旺報*，2013年12月13日，版4。

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提高戰略思維能力。」⁷⁷此外，《瞭望》周刊的一篇評論文章也指出，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方針宜採「辯證統籌、古為今用、主動運籌、循序漸進」的原則。⁷⁸由此可見，習近平當然無法與毛澤東相比擬，但在問題思考模式上，卻存在一脈相承的現象，並且表現在持久戰戰略上。⁷⁹

一、時間：機械化戰爭型態與信息化戰爭的矛盾

資訊化戰爭時代的來臨，讓過去農業時代或工業時代中，透過數量上的人海戰術彌補作戰能力不足的策略不再有效。⁸⁰在1991年波灣戰爭中，美軍所領導的盟軍面對侵略科威特後威脅沙烏地阿拉伯安全，並且陸軍軍力排名全球第四的伊拉克，竟然超乎包括中共在內的國際預期，在短短四十餘日就完勝伊拉克，並且傷亡人數低於100人。⁸¹這讓原

本預料美軍在此戰爭中，將重蹈越南戰爭覆轍，被拖入曠日廢時並在經費、人員傷亡過重，與國內反戰氣氛高昂情況下黯然收兵的北京大感震驚之餘，也認真思考工業機械化能力仍然低落、過時的共軍，與西方先進國家新軍事事務革命之間的戰力落差鴻溝。

對於美國資訊作戰能力的展現，讓中共領導人再度感到安全威脅，此前對於中共軍事戰略上，有關「人民戰爭」與「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矛盾，也由於嶄新軍事戰爭型態的出現，頓時煙消雲散。⁸²繼而起的是，北京所擁有的是機械化現代化程度仍相當不足的共軍，如何面對高度資訊化作戰能力強敵的矛盾。⁸³對此，經過十餘年的摸索與思考，中共軍方於2002年確立「統籌機械化與信息化戰力」的發展方向，讓中國大陸暨能應對短期的軍事安全需求，又能在長期上逐步跟上美軍的腳步，最終發展出超越美軍的資訊作戰能力。⁸⁴

77 「習近平：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中國新聞評論，2013年12月4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29/0/5/8/102905834.html?coluid=151&kindid=0&docid=102905834&mdate=1204215148>

78 摘自「中國抓緊運籌新時期國家安全戰略」，中國評論新聞網，2013年12月4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29/0/5/5/102905516.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905516&mdate=1204171835>

79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N.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4).

80 Arnaud de Borchgrave, Frank J. Ciluffo, Sharon L. Cardash, and Michael M. Ledgerwood, *Cyber Threats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Meeting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2001).

81 James F. Dunnigan, *Digital Soldiers: The Evolution of High-Tech Weaponry and Tomorrow Brave New Battlefie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73.

82 丁樹範，中共軍事思想的發展(1978~1991)(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96年5月)頁5-38。

83 Bernard D. Cole, "Command fo the Sea", In Steve Tsen, ed.,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Military Strateg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6) pp.44-84.

儘管如此，北京並未放棄戰爭中「人」的因素，一來中共解放軍並非是國家軍隊，而是共產黨的專屬軍隊，確保解放軍對黨的忠誠與中共政權的安全，是共軍首要政治任務，一旦軍心不穩將會嚴重危害到共產黨的持續存在，因此如何因應資訊時代的挑戰，訂定出有效的政治作戰就成為解放軍刻不容緩的挑戰；⁸⁵其次，中共認知到，即使再精良的武器系統，也需要精通資訊的人才方能發揮相乘效果，特別是在網路作戰上，更是如此。因此，處在工業化程度不足的北京，發展出「具中國特色的信息化戰爭」戰略，一方面弭平與西方先進國家之間的資訊戰力落差，另一方面也確保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安全。⁸⁶

二、空間：物理層次作戰與非物理層次作戰的矛盾

資訊作戰型態的到來，意味著戰爭的空間由過去的物理作戰，逐漸轉移至非物理性作戰，也就是具備資訊優勢的軍隊將能贏得戰爭最終的勝利。對此，北京1990年代起，除了積極進行制陸、制海、制空之外，基於

波灣戰爭與1999年北約在科索沃軍事行動中的教訓，也投注更大成本用於發展制航天權，1992年起所重新推動的載人航天計畫，不僅是當時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的政績工程，也是時勢所趨的關鍵性指標產物。⁸⁷同時，制電磁權也成為共軍五維作戰的重要環節。⁸⁸由此可見，共軍開始積極透過信息化建設，統整地(水)面、水下、空中、太空與電磁作戰能量，避免因各空間作戰罅隙所產生的作戰弱點。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核子武器的嚇阻效果外，在資訊時代裡，武器裝備與人員訓練的成本比過去更加昂貴，除非擁有作戰上不對稱優勢，否則以發展經濟為首要目標的各國，都不願輕啟戰端。這一情勢儘管有助於全球整體趨勢的和平，但卻無助於民族、文化、宗教與領土(海)主權爭端的解決。⁸⁹911事件之後美國同時深陷阿富汗與伊拉克戰場長達10年，耗費6兆以上軍費，反過來嚴重損害美國整體經濟發展，卻始終無法透過科技的優勢贏得戰爭。⁹⁰如何在不發動雙輸性的物理戰爭前提下，發揮資訊優勢確保

84 Anthony H. Cordesman, *Chinese Strategy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2017: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SIS, 2017).

85 張召忠，如何打贏信息化戰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6月)頁7。

86 Stephen J. Flanagan, Michael E. Marti,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5.

87 Brian Harvey, *China's Space Program: From Conception to Manned Spaceflight* (Chi Chester: Praxis Publisher Ltd., 2004).

88 參見付勇軍，第五戰場(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年1月)。

89 Thomas E. Copeland,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Carlisle: SSI, US Army War College, 2000) pp.22-40.

90 Marcus Corbin, *Horning The Sword: Strategy and Force after 911*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2003).

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就成為各國，特別是力量相對弱勢國家的主要關注焦點。

2003年12月，中共人民解放軍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所推出的法律戰、輿論戰與心理戰(合稱「三戰」)，顯示出北京除了要確保資訊時代中共軍的政治忠誠度之外，在對外作戰上掌控陸、海、空、天、電空間同時，還要將作戰空間延伸到法律、輿論與心理層面。共軍的設想，在理想狀況下，掌控敵我雙方在法、理、情認知的優勢，將能不需透過，或少量透過武力，即能達到國家戰略目標，而無須耗費過於龐大又不確定性高的戰爭。⁹¹對此，台灣軍事研究界，特別是軍方一開始就相當關注北京的三戰發展，但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直到2010年，特別是釣魚台與南海主權爭端再起後，才逐漸重視並憂慮共軍三戰在解決北京與兩岸、國際爭端中，三戰所扮演的角色。⁹²林中斌與亓樂義共同指出，中共「三戰」是和平統戰、超軍事手段與軟實力的運用，這顯然是對三戰的誤解，因為心理戰並未排除使用硬實力，特別是武裝力量來遂行其目的；⁹³究

其實，「三戰」可視為北京解決「硬實力」與「軟實力」矛盾的「巧實力」。⁹⁴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學者張蜀誠、美國學者那法羅(Peter Navarro)不約而同地認為，若將心理戰視為硬實力所導致敵方心理情緒方面效應，那麼北京對日本、南韓、菲律賓與我國所進行的經濟制裁，實際上也屬於心理戰的範疇。⁹⁵更值得注意的是，從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丹碧莎·莫尤(Dambisa Moyo)等學者研究中發現，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必須透過侵略以獲得領土及經濟利益的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則靠貿易來達成，而且不會引起侵略與反侵略、殖民與反殖民的矛盾性衝突與仇恨。在這方面，北京透過貿易、經濟援助與技術合作等方式，取得油田、礦場甚至土地。⁹⁶此一非軍事的經濟性行為，及其對當事國所導致的心理戰效應，實在值得密切與審慎關注。

三、力量：機械化作戰與信息化作戰的矛盾

文章前面已提及，中國大陸1990年代以來面對的是機械化能力不足的現狀，及需打贏資訊化戰爭的挑戰。對此，經過十餘年的

91 張文廣編，中共「三戰」策略大解析(桃園市：國防大學，2008年11月)。

92 參見2010年至2017年美國國防部編撰之「中共年度軍力報告書」三戰乙節。

93 林中斌、亓樂義，撥雲見日，頁151、316。

94 有關巧實力，可參見Joseph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 PublicAffair, 2011)。

95 Peter Navarro, Gordon G. Chang, *Crouching Tiger*, p.63；張蜀誠，「中國大陸93閱兵的前置性三戰」，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48期，2015年10月，頁40-57。

96 傅好文(Howard W. French)著，李奧森譯，*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15年10月)；丹碧莎·莫尤(Dambisa Moyo)著，黃中憲譯，*當中國買下全世界：全球資源布局戰的最大贏家，如何掌控世界商品的供需網絡*(Winner Take All: China's Race for Resource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台北市：野人出版社，2013年1月)。

摸索，共軍在2002年起決定，以統籌機械化現代化與信息化現代化軍事建設，化解此一戰力矛盾困境，並期能畢其功於一役。

儘管丁樹範博士認為，波灣戰爭爆發後，共軍不再存在軍事思想的派系矛盾，對於發展資訊化作戰能力擁有相當大的共識；然而，在尚未獲得資訊作戰能力之前，應該如何在有限資源下，制定有效策略弭平生存與發展之間的矛盾，其實仍存在軍事路線之爭。美國軍事戰略專家白邦瑞指出，1993年到2000年間，共軍對於如何打贏資訊戰爭存在不同派系意見；這些派系分別是「人民戰爭」思想、「現代戰爭」思想與「資訊戰爭」思想，彼此之間對於如何打贏資訊時代的戰爭存在歧見。⁹⁷不過，白邦瑞也認為，其實共軍有關新軍事事務轉型的觀念，實際上完全抄襲自美軍而來。但誠如張明睿博士所批評，白邦瑞以美國的主流思維形成對中共戰略思想的偏見。因為，共軍是以辯證法的矛盾對立統一來整合派系之間觀點的矛盾，實際上並沒有界線分明的思維，而是彼此互相借鑒、吸收與批判性的融合。⁹⁸

再者，白邦瑞也忽略中共對美國與其說是抄襲，不如類似「書法臨摹」更加貼近事實。「臨摹」有正反合三個階段，先是弭合自己與臨摹對象的矛盾性差異，再來是弭

合成功臨摹與自成一體的矛盾性差異，最終則是弭合自成一體超越臨摹對象的矛盾性差異。共軍的打贏資訊化軍事策略方案，與美軍最大不同點，就在於前者以打贏後者為目標，而不只是後進式的模仿。這一點，白邦瑞在最近所做的研究，得到證實與修正。

由於篇幅限制，作者僅舉兩個案例作為實證性指標：其一是為解決戰略性導彈對海上目標，特別是航空母艦精準度不足，而精準度高的巡弋飛彈射程又不夠遠的矛盾問題，共軍研製出DF-21D、DF-16等可以精準攻擊海上目標的戰略導彈。其二是為解決固定式核子彈道飛彈精準度強，但是容易遭受第一擊而毀滅，機動式核子彈道飛彈安全性強，但是精準度不足的矛盾問題，北京建構起「地下長城」，也就是各固定發射井之間，以地下通道串連，讓戰略導彈得以進行機動轉移的同時也能維持其應有的精準度。現在火箭軍已經在20多個省修建起了地下長城，已經修建起從西藏直達福建，遍布全大陸的5,000公里的地下核飛彈高速公路，至今還在數十個施工地點施工。⁹⁹其他案例還包括為解決隱形戰機與發動機性能不足的矛盾問題，先推出隱形戰機、外購發動機，然後再逐步改進發動機性能來弭平矛盾。空軍其他先進戰機與海軍艦艇亦然，先引進、再透過

97 Michael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8 張明睿，解放軍戰略決策的辯證，頁23-50。

99 梅長蘇，「中國地下核長城有多長？美國嚇壞了！從西藏延伸到福建，全長5,000公里！3,000枚核彈頭的強大反擊能力足令美國灰飛煙滅！」，大時代，2017年6月21日，<http://www.twgreatdaily.com/cat35/node1233188>

山寨改進，等技術成熟之後再定型量產，其中最受關注的例子當屬空軍殲-11B與航空母艦的研製、發展模式。

從共軍1990年後的實際軍力發展可以看到，由於經濟發展成效巨大，再加上戰爭型態改變所帶來的危機感，讓解放軍有資源同時積極探索與建構機械化現代化與信息化現代化並舉的軍力發展工程，而且速度也正逐漸加快。¹⁰⁰波灣戰爭後的1993年中共人民解放軍推出「高科技條件下人民戰爭戰略」，1999北約科索沃軍事行動後北京再度推出「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戰略，2002年則再度提出「信息條件下局部戰爭」戰略；美國分別在2001年、2003年所發動的阿富汗作戰與對伊拉克戰爭中，所展現的資訊戰能力，促使北京於2002年起轉變為「信息條件下戰爭」，希望透過具中國特色的信息化軍隊建設，「打贏信息條件下戰爭」，並期望能在2049年建構出與美軍相當，甚至超越美軍的作戰能力。

可以看到，1990年代以後，共軍統籌國內與國外科技、統籌民間資訊技術與軍事資訊技術、統籌經濟發展與軍力發展、統籌物理性武力與非物理性武力，以及統籌軍事作戰與非軍事作戰行動之間的矛盾，其整體軍事力量與軍事活動空間正隨著綜合國力的高度發展而快速擴張。同時，中共空軍將過去專注在國土防空的戰略，轉向攻防兼備與空

天兼備的戰略方向，海軍則將兵力投射範圍由過去的近海，擴張到北極圈海域與印度洋至非洲一線，還為此正積極建構「珍珠鏈」策略，2017年甚至首次建立起吉布地海外基地，擴大其作戰範圍。在太空戰略方面，也逐漸由剝奪敵人運用太空的能力，擴張至在太空空間中行動自由的能力。與此同時，網軍也藉著滲入、竊取與破壞他國軍、民用資訊系統操兵，嚴重傷害到其他國家的資訊安全。中國大陸的崛起與美國的逐漸衰弱，成為全球穩定的憂慮。

值得注意的是，在軍事力量超越美國之前，「和平崛起」以確保中國大陸能安然達到「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仍然是中國大陸戰略主軸，因此如何在不引爆與華盛頓之間的戰爭，化解與台灣及其他國家之間的領土(海)主權、歷史仇恨與經濟利益衝突，達到戰爭才能夠的目標，就成為北京決策者必須克服的矛盾。在這方面，中共採行「量變質變」的路徑，以「切香腸」策略，由民間啟動、民兵在前正規武力在後的模式，掀起規模不足以引起美軍戰爭反應的軍事衝突，謹慎而漸進式的向戰略目標前進。

北京此一戰略相持策略，對於美、日、韓與我國則屬意圖改變區域現狀的挑釁行動。¹⁰¹同時，大陸儘管強調戰略的防禦性質，但在戰術層面則採取攻勢作為。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亞洲項目負責人包道

100 Bernard D. Cole, "Advanced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PLA: Priorities and Capabil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Larry Wortzel ed.,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rlisle: SSI, 1999) pp.34-62.

101 張凱勝，「美議員抨白宮 空識區立場混淆」，旺報2013年12月5日，版2。

格認為，大陸宣布劃設防空識別區不至於引發直接對抗，但是適時地改變了地理影響的範圍。¹⁰²邁阿密大學教授瓊·托伊費爾·德雷爾也認為，「切香腸」是中國戰略政策的重心。此種策略推進非常緩慢，因此很難判定日本或任何其他國家應該對什麼目標作出強烈回應。¹⁰³奇科·哈倫(Chico Harlan)則指出，大陸近年來在周邊海域和空域步步為營，用「小碎步」代替「大跨步」，一步步將自己的控制範圍向外擴大。¹⁰⁴

對於大陸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術作為的認知，並非僅限於美日兩國的專家。印度學者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也將中國大陸的策略目的，在「一步棋幾步走」、「步步為營改變現狀」，「建立實際軍事存在」，最終「不費一槍一炮震懾對手接受中國領土主張」。同時，這一「以守為攻」的策略還將「戰爭罪責」轉嫁到對手身上。甚至，中共國防大學教授張召忠以「包心菜策略」來論北京的戰略，亦即先對領土提出主張，然後多重守護這塊區域，從而拒絕他國進入。這種方法穩步推進，以智克敵，

可以成功創造「新事實」。這種辦法總是先製造爭議，通過侵入主張地區的管轄權，然後延長侵入的時間和頻率，建立實際軍事存在，最終使對手按中國的方案達成協議。¹⁰⁵

在與日本之間的東海劃界與釣魚台問題上，以及在南海海域爭端中，都可見北京藉著「切香腸」戰略逐步擴大自身實際管轄權面積。同樣值得關注的是，這些事件與衝突當中，中共的「三戰」皆貫穿其間，在嚇阻目標國家的同時，也對國內與國外進行政治性統戰，期能以最小代價鞏固自己、增加盟友、減少敵方盟友而最終孤立並瓦解敵人鬥志。

最讓共軍感到焦慮的是，因經商而貪污腐敗嚴重、紀律廢弛、軍事組織過於龐雜且不利於聯合作戰的制度，以及自1979年以來由於並未再度對外作戰而缺乏實戰能力的共軍，與在軍事費用、安全盟友、軍事組織、作戰準則與武器裝備均明顯佔有優勢的美軍之間的矛盾對立困局。對此，共軍不僅大幅提昇軍費、改善武器裝備、持續裁減軍隊、提升軍隊整體素質之外，1998年起禁止軍隊

102 「中國用圍棋戰略削弱美在亞太影響力」，中國新聞評論，2013年12月11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29/1/7/2/10291720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917209&mdate=1211101602>

103 「美媒：中國防空識別區是反美國介入戰略一環」，中國新聞評論，2013年12月3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29/0/1/4/102901410.html?coluid=148&kindid=7550&docid=102901410&mdate=1203104423>

104 黃蔚，「專譯：中國東海碎步走步步為營 日招架不住」，中國新聞評論。2013年12月3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29/0/0/3/102900399.html?coluid=93&kindid=7492&docid=102900399&mdate=1203011721>

105 黃博寧，「專譯：印鷹派稱識別區乃包心菜戰略段數高明」，中國新聞評論，2013年12月6日，<http://hk.crntt.com/doc/1029/0/7/9/102907961.html?coluid=93&kindid=10094&docid=102907961&mdate=1206184637>

經商，讓海、空及二砲領導人納入中共中央軍委會，習近平時代甚至將七大軍區精簡至五大戰區、成立陸軍總部與火箭軍，更比過去嚴格要求軍隊必須在演訓方面必須貼近實戰，以弭合缺乏實戰經驗的矛盾落差。

結 語

本文旨在以辯證法的矛盾對立統一律為研究途徑，以戰略三要素為研究變數，分析中共人民解放軍自1927年8月1日成立至今的戰略制訂、發展與變遷。根據前面針對中共軍事戰略整體發展脈絡可見，中國共產黨及其軍事領導人乃以馬克思辯證法中矛盾統一律，作為解讀外部世界、歷史發展與策定軍事策略的思維基礎，這一點與西方主流軍事思維存在本質上的不同。誠如李約瑟(Joseph Needham)、大衛·藍普頓(David M. Lampton)所指出，中國人的思維是「有機」的，在他們的認知途徑裡，思想不是直線的，而是以相互關聯和互相影響為前提。在任何時刻，都必定反應兩造綜合實力平衡。對中國人而言，力量平衡有變動，行動也隨之將必定調整。¹⁰⁶

從辯證法矛盾律的角度以觀，中共如同白邦瑞所謂的主宰世界的「百年計畫」其實並不存在，¹⁰⁷反而近似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所認為的，中國的內部辯證式的活力創造出對外的雄心。帝國經常不是有意識的追求來的，反而是國家變得強大時，基於發展需要並且出乎意料地出現全新的不安全感，導致他們以有組織的方式擴張。¹⁰⁸因為中共是依據所處環境變化所產生的挑戰，去做出辯證性的回應，這一點與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的「挑戰與回應」見解是相同的。富國強兵的確是中共領導人念茲在茲的努力目標，但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國家也都以此為目標，即使是中立國家亦然，不能以此做為主宰全球的證據。也因此，部分所謂「積極進攻」戰略不僅未見諸中共正式戰略用語，也不具備類似「積極防禦」的矛盾律特性思維，更重要的是，進攻本身就是積極的，是否有需要在進攻之前加上「積極」二字，存在邏輯上的問題值得商榷。不過，此語用於軍種作戰以對應戰略上的防禦則屬適當。

對於中共軍事戰略是否屬和平與防禦性質，林中斌教授曾經針對中國是否愛好和平指出，從歷代版圖逐漸擴大的事實看來，北京並不能算是愛好和平的民族，而是基於安全而進行進攻的一連串活動。同理，從中共作戰範圍由邊遠山區或小農村，逐步擴大到整個中國大陸，再擴張至近海、印度洋而達到非洲一線，顯示出共軍的兵力投射範圍

106 David M. Lampton, *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p.220-2.

107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2016).

108 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林添貴譯，*地理的復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17年7月)頁271。

逐漸加大的事實，這對周邊國家，特別是與北京之間存在領土(海)、權力爭奪問題的國家，構成了不可忽視威脅；更有甚者，對於共軍而言，安全與威脅，或防衛與進攻，其實都是矛盾對立的一個整體，中共軍隊可藉此兩極矛盾點之間，取得相當大的運作空間與彈性，讓軍隊得以藉著防衛之名行進攻之實，也可以藉著安全之名行威脅之實。一個有趣的案例就是，過去數十年間，北京不餘遺力地指責美軍在海外設置軍事基地是帝國主義的霸權行為，但自己卻在安全的名義下，廣設「珍珠鏈」與成立吉布地海外軍事基地，還派出正規部隊駐防。

誠如美國戰略學者史溫(Michael Swaine)所認為，在實力不如美國的情況下，中共將

採取「謹慎戰略」，在實力懸殊情況下避免挑起對自己不利的戰爭。¹⁰⁹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大陸為達成「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要解決收復「失土」與和平崛起的矛盾，以及化解與美國之間的「修昔底德斯」陷阱，就必須持續以和平之名發展攻擊性資訊化武力，並在不引發戰爭的情況下，逐步收復「失土」並藉著三戰掩飾其擴大勢力範圍，最終達到成為全球性強權的目標。毫無疑問，在大陸本土以外，中共所宣稱的安全，卻是對其他國家的嚴重威脅。

作者簡介

李明正先生，大仁科技大學觀光系副教授、系主任。



陸軍CH-47SD運輸直升機(照片提供：葉秀斌)

109 Michael D Swaine,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RAND, 2000).